

□ 赵璐璐

2011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央党校文史部历史教研室工作，张军老师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同事。加之张军老师和我均是学习中国古代史出身，他师从北师大黎虎先生，是我学界的前辈，因此我和张军老师的接触与交流相对比较频繁，对他的研究领域和为学为人日渐有了深入的了解。

打破学科界限 拓展研究领域

张军老师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其专著《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阐明了汉魏晋军府制度的渊源，并揭示了其演变历程，认为军府的制度渊源来自于两个相辅相成的制度变迁，即“幕府的公府化”和“公府的幕府化”，至东晋时军府制度定型，也意味着其在整个军事行政体制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军政对民政系统的侵蚀抑或取代已成大势所趋。全书从军事制度的演变着眼进行观察，试图去阐释汉魏晋时期制度变迁的轨迹和关键动力，关心的是一个广阔和宏观的历史问题。

而在暂时将博士学习阶段的研究画上句号之后，张军老师又将研究视野投入到中国古代其他朝代和领域之中，先后撰写了《宋元时期的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古储君制度研究》两部史学研究专著。《宋元时期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唐宋大变革的视角下，探讨了传统中国在走出中古贵族制社会之后，如何迎来中华文明的高峰期，在“中华文明造极于宋”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阶层如何形成强大的力量，发挥了突出的政治社会功能，作为政治主体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并如何塑造了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文明形态的。这部书是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知识分子通史”中的一卷，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于知识分子通史的空白。《中古储君制度研究》详细考察在汉唐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储君作为皇位的继承者，在以皇帝为中心的顶层制度设计中，居于何种地位，其权力是如何运转的。这也是张军老师关于中国传统君主制度研究的三部曲之一，旨在论证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主体性与正当性问题，



尚有《近世储君制度研究》与《君主论》两部书的写作正在进行中。

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而言，跨越王朝断代进行研究十分不易，需要阅读大量原始史料，同时也需要有不凡的理论功底。张军老师在适应党校教学科研要求的大背景下，勤于耕耘，勇于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让同为学习中国古代史出身的我深感敬佩。更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到历史学之外，通过攻读民族学的博士后，进入到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去，发表《社会宏观因素对西藏自治区民族关系中的内隐偏见影响研究》《近五年来西藏藏汉民族关系调查报告》等系列文章，并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订出版《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一项关于西藏自治区藏族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张军老师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系列研究，通过对西藏宗教认同、民族认同的历史与现实的建构，解读西藏的民族、宗教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分

析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我国国家在西藏地区所实施的国家认同建构的种种努力，进而指出如何建构统一的国家认同问题。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集中了历史问题、民族问题、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论题，对于它的研究，需要学术勇气、研究积淀和现实关怀。张军老师的这种学术追求是他作为一名党校教师的自觉，他经常说起党校教师 and 高校教师的不同，认为党校教师不仅应该理论功底过硬，而且要具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要能够通过古今中西不同维度去观察和探讨各类理论与现实问题，回应教学对象的现实关照和理论诉求。他在不同班次不同内容的教学中皆获好评，是与不断自觉拓展研究领域，努力整合多学科观点来探索问题分不开的。

得益于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积累，张军老师在党校不同班次讲授“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强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资治通鉴》与为政之道”等多门课程，议题涉及面广，跨越时间长，极富挑战。但张老师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以科研为根基，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打磨，课程均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201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课程荣获第四届全国党校系统精品课称号。

近年来，基于对党校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的思考，张军老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作为重点，致力于从这一角度指导研究生和开展相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得到深入和丰富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在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成果。张军老师从党校研究生培养特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认为党校历史学的研究生培养，应积极发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

展历史，重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时代化，为新时代中国道路发展提供经验和支撑。在这种学科定位和发展理念下，张老师对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做了许多专题研究，并且指导研究生在这一范畴内选题写作，逐渐积累，期望形成规模化、连续性的研究成果，从而在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和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深入透彻的认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代再次焕发生机。

急人所急 常怀他人

张军老师在为学上不断创新突破，但在为人上却始终保持着为他人考虑、急人所急的品质。我还清楚记得我刚工作不久，组织部新教师培训要求每个人进行模拟试讲，在试讲之前先按照要求在教研室范围内讲授梗概，请教教研室老师们帮助改进。当时我依旧按照历史学专业课程的讲授方

法准备自己的试讲，在讲完后，张老师便立即提出我讲授的缺陷，并向我仔细解释党校课堂的不同和党校课程的要求。作为一名新进教师，如果没有一位前辈老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细致和明确地解说，我想这个摸索过程将会较为漫长。正是由于张军老师的提点，才使得我及时改进备课重点，之后的试讲也得以顺利完成。更让人暖心的是，张军老师事后又单独与我交谈，似乎是担心他的意见过于明确，怕我受到打击会产生畏难情绪，其实张老师的提醒非常及时，作为新人和后辈我也本就抱着重新学习的态度，但张老师却思虑周详，既考虑课堂的成效也注意我们新人的心情和内心感受。

对于指导的研究生，张军老师也同样保持着这样的关怀。曾有两位张老师的研究生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帮助他们备考的过程中，张老师特意拜托我跟他们谈谈中国古代史的备考要点和注意事项。虽然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张老师说我的信息和经验更加新鲜更为贴近，我听后不由地默默感叹他为学生考虑周详用心良苦。这几年来，张军老师因担任教研部领导，行政事务日益繁重，但他为人做事常怀他人之风始终如一，不曾改变。每次与我交流，都对我的讲课与未来发展多有考虑，常令我受益匪浅。

细细想来，张军老师不断在新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体现出的正是作为一名学术工作者不忘本心、坚持追寻的为学理想。偶尔也会听到张老师谈起由于党校教学研究的特殊使命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科本身的特点，有时不能完全根据自己学术兴趣寻找问题，但他并不消极，而是以一种不断学习的的热情和探寻真理的坚持去面对问题，一点点在学术层面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层面上，为学最终乃是为人。一个人，无论人生低谷高潮，所怀品质不可丢；一名学者，不管如何去发掘自己的研究领域，探索真理坚守学术理想的信念不可变。



物质幸福与学术人生

□ 吴传毅

今年春节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来临》的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因为这篇文章触动了今日中国无数人的心灵。过去，从贫穷中刚刚走出来的我们对物质有着本能的追逐，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确实给自己带来了短暂的安全感、满足和快乐，其中有一些有学术天分的人放弃了学术之路，选择了可以快速增加物质财富的职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物质层面的满足是半满足。而当全面小康建成之后，人们更多的会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因为精神层面的满足才可以持久，才可以永驻于心。今天

中国人在物质丰盈的条件下，开始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和满足。于是，一些人有了物质以外的多项选择，这其中就包括不少人选择读书思考和写作，以期通过这些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以为，把读书思考写作当作工作常态，以学术为职业，并有学术天分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在物质缺失的年代，学者们或许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难以静下心来做学问，这就给学术人生带来了些许遗憾，学术人生抑或说不敢说是最为幸福的人生。

今天中国的情形大为不同，真正的学者完全可以铸就幸福的学术人生。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的职业与爱好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愉

悦身心，而且还可以获取稳定的经济保障。学者们可以让自己的思想飞扬，可以为人类前行举起一个火把，抑或通过咨询形式把自己的真知灼见转变成当政者的决策，并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们的幸福与福祉，不能不说是学者们的社会价值体现。

当然，不能说从事其他职业就不幸福。准确地说，只要把工作当作事业，都能在工作中享受快乐、享受幸福。之外，做学术也是有条件的，除了有充裕的时间和爱好之外，自身的天分也十分重要。没有天分或许只是坊间说的“学错了行”。其实，做任何工作都需要天分，天分不足，通常只是获取了一

份工作，很难在其中享受到快乐，也难以取得较大的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天分与勤奋密切相关。没有勤奋，万事难成。做任何工作又都不能只凭天分。鲁迅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萧伯纳说，“所谓天才人物指的就是具有毅力的人、勤奋的人、入迷的人和忘我的人”。狄德罗说，“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门捷列夫说，“没有加倍的勤奋，就既没有才能，也没有天才”。所以，只有勤奋阅读思考和写作才能在学术生涯中收获到丰硕成果。

学术随笔



中央党校掠燕湖中的“一夫红船” 孙宇婧/摄

（上接5版）

“作为中央党校培养的博士，我一定要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已经报名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下属的乡镇做一名基层公务员，并即将在毕业典礼结束后奔赴西藏。”

在中央党校2017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上，2014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孟辽阔的发言引来了阵阵掌声。

翻开孟辽阔的成绩单，一篇篇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格外抢眼。在中央党校2014级博士生三次奖学金评比两次综合排名第二；荣获“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学术科研成果奖”，荣获“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十大优秀学员”称号……一个这么优秀的中央党校毕业的博士生，本可以轻松进入环境优越、待遇丰厚的工作岗位，却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记者带着这一问题走近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走进研究生院党委、走近孟辽阔的组织员、走近他的同学、走近他本人，找寻答案。

感恩祖国、感恩老师、感恩每一个伸出援手帮助他完成学业的人。求学路上，粒粒感恩的种子早已在孟辽阔的内心种下。孟辽阔出身于河南省泌阳县农村，兄妹三人上学，经济来源依靠当教师的父亲和农村务农的母亲，其中的困难不言自明。他大学是在海南大学读的，大学期间的学费主要是国家和学校提供的各种奖、助学金。大学期间他两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获得“海南省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还获得了海南大学设立的其他助学金。后来，在广东省委党校读硕士和在中央党校读博士，他都是在奖、助学金的资助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下走过来的。他说，对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养育、党的培养，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我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祖国和人民的养育，回报党的培养。

党性教育是中央党校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它既渗透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也融入到校园文化和日常生活里。无论是校园里的红色雕塑、红色经典剧目的演出，还是每一次党日活动，党性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静静地播撒。他说，正是在中央党校这三年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更进一步提高。

研究生院院长潘悦谈起孟辽阔，充满了赞许和关爱，她说，辽阔同学是一位难得的好苗子，朴实无华，真诚坦荡，热爱生活，学习勤奋，视野开阔，富有家国情怀和积极进取精神，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组织员苏燕老师告诉记者，孟辽阔是真正把党性锻炼贯穿到学习、工作和生活全过程的优秀代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立场鲜明、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支部书记，他恪尽职守，勤勤恳恳，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他邀请老党员贾红生先生讲革命历史，带领支委在古北口长城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他被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授予“十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们支部连续几年被评为院“优秀党支部”，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他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状态投身于学业，跨专业考入中央党校，仅在攻读博士期间，就发表学术论文13篇，获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真正是品学兼优。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而奉献则生发于能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的无私精神和青春豪气。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事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中央党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自然的选择。西藏海拔高，高原相对内地缺氧，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是孟辽阔说，我已经抱定决心，绝不后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就是我接续前行的动力。作为新时期的青年，作为党一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作为一名有着9年党龄又在中央党校的大熔炉里淬火历练的共产党员，一定会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